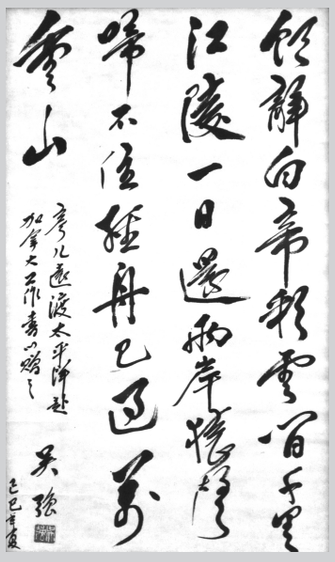
忆爸爸吴强

□尹 彦



这些年在海外闯荡，和年轻的学生们打交道，常常忘却了自己的年龄。但有时还是免不了会察觉到时间的痕迹，我深切地体会到，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年轻人在幼年时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小玩电脑，电脑很熟，英文阅读不错，可是字写得好的不多，文章写得好的不多，能吃苦的不多。常常觉得，如果在现在的教育中增加一些传统文化教育，恐怕对后代会有很多帮助。想到自己小时候受到的父母关爱和帮助，深深感到有这样的父母是多么幸运，这些关爱和帮助潜移默化，对我们今后的成长影响很大。

文化大革命中，家里许多东西都丢失了，我心爱的书、作文簿都丢了，钢琴也贱卖了，许多珍贵的古籍没有了，但是我的小楷簿却逃过此劫，留了下来。我一直珍藏着，每每翻阅，小时候的情景便历历在目。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学习的乐趣，回味无穷。

父亲作为一个作家具有极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强的洞察力。对我们总是因势利导，从不强迫。我小时候酷爱书法，这点应该是受父母的影响，特别是父亲。我爱看父亲写字。他写字的速度不快，但总是整篇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流畅遒劲。我1989年夏天出国前，他书赠与我两幅字，一幅是“学海无涯”，另一幅是李白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时，他已是79岁高龄，可笔法仍然是如此的有力优美，显示他依然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无论是看整篇还是琢磨每一个字，都令人赞叹不已。不想来年4月竟然就辞世而去。

我高中起便住校。每日中午趁午休时，必写三行小楷后才去休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每周回家，父母轮流圈点，眉批，打分。父母都在我的小楷簿上留有墨迹。每次父母圈点完了，我心里都非常高兴，我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进步，也体会到父母的关爱，感到学习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做事的恒心。后来搞科学，在国外办公司，搞研发，都是靠的这股恒心，毅力，克服困难。这么多年来，深深体会到，世界上没有容易的事，但另一方面则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凡事只要认真，有恒心，一定能成功。

文化大革命刚过，我因病在家。1977年，我家被抄走的一台带短波的飞利浦收音机被还回来了，我找到了英语900句的广播节目，正好教到第四课。我就跟着天天学。爸爸看到了，就到外语学院找人要了一本“英语900句”的教科书给我，我拿到书时真是喜出望外，我并未开口，也没想到他能找到书。那时听“美国之音”还不能公开，“英语900句”十分难弄到。有了这本书，我不但学会了900句，还做了全部的练习，背诵了所有的短文。1982年出国前，就能和外宾交流无碍。

那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我每月才46.5元人民币。而父亲的问题还未解决，工资也未恢复。我想要一台录音机学英文，市面上根本没有卖的。北京的一位朋友说，他的一位朋友可以弄到一台二手的录音机，要500元人民币。那可是一大笔钱，但父亲答应了。我们在那位朋友家等了足足4个小时，才拿到那台二手的AIWA 录音机。父亲还又请他们到饭店吃了顿晚饭。不过，这钱没有白花。我用这台录音机做英文听写练习，很快就能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了。

正如爸爸在我的小楷簿中写的：“写字须如行云流水，通畅而有力，切忌呆滞。缺少灵气。临帖非一味模仿，意在得其神味，从而创造自己的风格”。他自己的字和书做到了这一点。他也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创造自己的前途。我从小喜欢科学，初中时常常在实验室给老师当助手，还喜欢拆东西。父亲出国访问带回来机械类的玩具，让我自己做吊塔，搭房子。到了高中，我的作文也不错，老师常常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念。临高考时，我又动了读文科，以后当作家的念头。爸爸对我说，作家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有了生活，今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作。你从小爱科学，还是搞科学。后来经常想到爸爸的这些话，觉得这话深刻极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的弟弟妹妹们也有过类似的故事。父亲不是多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是生活的结晶，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对我说的话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总结。

那些年，中国国情的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爸爸是个老“运动员”了，每一次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我们家原来在南京，爸爸1952年因建军人文化俱乐部而被报刊点名批判，整肃一通之后，离开了军队，来到了上海，写成了他的成名作《红日》。他的被贬，使得他反而有机会专心写作，将他多年积累的生活素材写成书。

他的小说《红日》使他成名，也给他带来灾难，十年浩劫之中，他因此而吃了不少苦头，但爸爸是个意志坚强的人，逆境中他总能看到光明，总能冷静地分析情况，克服困难，迎来最后的胜利。“文革”之中，我因为“是反动老子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的苗子”而被学校的造反派屡屡批斗，昔日的同学、好友成了不相识的陌生人，甚至对头。那种孤立无援的感受，使人觉得世界之大竟容不下小小的我了，那种气愤，伤心，真是难以描绘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别无瑕疵可寻，尚且遭此待遇，爸爸那样有许多政治运动的“前科”，又写了一部大“毒草”，他受的苦更是可想而知了，他多次遭受全市电视大会批斗，扫厕所，戴高帽，蹲看守所，60多岁的人还要挑土，圈海造田。爸爸的许多熟人，朋友都因受不了这种折磨而弃世。但爸爸对人生的热爱，对世事的洞察，对家庭，对子女的爱，使他渡过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难关，他说当时他什么都想过了，一定不能死，要活着看到把事情弄清楚，要看到那些整人的人的下场。

爸爸一生笔耕不已，去世前几个月在巴尔的摩的小妹妹处，仍然在写，直至不能持笔为止。翻阅我保存的爸爸的书信，他1985年写信到美国给我时，还在说“春节之后，就到南京去写小说，再瞎混下去，东跑西颠，过一年、两年，一旦写不动了，那将后悔莫及，我将珍惜这个晚年的光阴，再写一两部长篇小说，你赞成吗？你会预祝我成功吗？”是年，他75岁。那年5月，我由美国回国，爸爸仍在南京写作，我由上海回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时，到南京去看他。次年，他写信给我时又说，“我已经76岁，再不写点东西，心中不安。”写作是他的生命线，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写作使他的思维敏捷，年轻，使他的晚年充满活力，人，一定要给自己的一生树立一个目标，只有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才会觉得生命的意义，生命也才会因之而发出光彩。

他看上去一点也不显年老，精力充沛，谈吐风趣，头脑清楚。他不仅以文交友，以棋会友。年纪越大，他越欢喜和年轻人交朋友，越注意自身的修养。爸爸是个热情，乐观，豁达，好帮助人的人。给朋友、亲友资助是常事。他待人真诚，平易近人。我出国之前，在合肥科大工作，托学校的司机趁去上海之便带东西，司机有一次碰见我，十分真诚地说，“你爸爸给我的印象很好，一点架子也没有，你以后有事只管找我。”我也听爸爸说过他是如何与这位从不相识的司机师傅交上朋友的。爸爸的这些小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那年回家探望母亲，整理挽联，看到许多挽联都提到真诚。如田芜写的：“真诚方可成知己，平易自然能近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挽联是：“磊落平易，文采照人”，追悼会上不仅许多老人拄着拐杖而来，还有许多年轻的朋友。

日前，在美国与儿时的朋友徐阜相逢，聊起往事，才知道徐阜的弟弟林羽的命还是我父亲吴强救的。那还是在1946年，在苏北农村，小羽才两岁。在那战争年代，小羽生下来便被托付给当地的老百姓抚养. 小羽的父亲徐平羽在部队各处奔波，母亲林琳则在苏中某地的青救会忙着。 小羽不知怎的，不断拉稀，眼看不行了，林琳闻讯赶回来，急得直掉眼泪，看着奄奄一息的小羽，束手无策，无奈之中，只好准备好棺材，着手办后事了。已是黑天，我父亲随部队路过，顺便去看望老朋友的家人，一见此景，不免大吃一惊，再一看小羽，还有一丝气息，就对林琳说:”你真糊涂，孩子还没死呢!”那时不仅是天黑，还下着瓢泼大雨，我父亲策马飞奔了几十里地，请来了医生，救活了小羽。我立即和在北京的小羽通了电话，小羽长大后成为骨科大夫，事业有成，电话中小羽说，妈妈林琳常对他说，“你的命还是吴强伯伯救的”。

可是我们几个子女却从未听父亲说过此事，可见父亲并未把自己救人一事放在心上，这种帮助人的事对他来说太寻常了，不值一提。爸爸倒是常提起，他小时候出天花，眼看不行了，家里人把他用席子捲了，扔在路边，被一个好心的老奶奶捡回家，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硬是把他救活了。

1946年，父亲36岁，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向往自由民主，他早年参加共产党，浴血奋斗，打败了日本鬼子，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近70年过去了，人们看历史的角度和深度也同样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千秋功罪，由谁来评说。可是，我想爸爸写的《红日》，忠于历史史实，他写出了中国近代史这关键一战的孟良崮战役是怎么打的，许多战术的细节都不马虎。他既写了我方的胜利，也写了我方的失败，写了我方的可圈可点之处，也写了我方的可批可叹之处，他也实事求是地这样如实地描绘了我们的敌人。他的现实主义使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但这也使得他能立足于中国文坛，特别是中国军事文学，可以经受历史的考验而不倒。他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艺术性和真实性，所谓文如其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和他的为人有关。他实事求是、心地善良、爱帮助人，反右时，他自己差点被打成右派，可他还设法帮助照顾其他的“右派”。我们在他去世后，才从人们的回忆中知道，他这一生，救了不止一个人，救小羽仅是其中一例。

我1982年出国，到美国做访问学者，1985年回到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了4年。5月份我回国后，父亲特地到合肥来陪我住了一个月。我白天上班，他便在宿舍写作，傍晚一起在校园里散步，父亲和我的同事们都成了好朋友。他们都经常来和父亲聊天，下围棋。他一生有两样业余爱好，下围棋和打弹子。这两样他都不错，下起棋来更是茶不思饭不想。他还是上海围棋联谊会的会长。在科大一个月，他和我的许多同事成了朋友。他的敏捷思维给人印象极深，青年人都欢喜和他交朋友，他也能叫出许多我的中学、大学以及工作时的同事、老师的名字。

1987年我开始业余翻译美国著名作家诺儿曼·卡曾思的《人的选择》。这本书是1982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时，卡曾思先生送给父亲的。我在美国深深体会到美国人民对卡曾思先生的崇敬和热爱。他的以乐观主义克服疾病的事例被列入美国的教科书。爸爸对此非常关心，为我看稿，此后又应出版社要求为书写了序。此书于1989年出版，爸爸在1989年12 月来美时，还亲自为我带来10本。现在每每拿起这本书，便感叹不已。想想自己一生得到的他的关心和帮助，真是难以胜数。而今却再也无法报答了。

1989年2月，爸爸去巴尔的摩我小妹妹处，转来温哥华时，已身患绝症。尽管不知道是什么病，但他已意识到自己病的严重性了。在旧金山转机时，他已不能持笔签名。到温哥华，我去机场接他，见他比12月份到旧金山时瘦了许多。强烈的生存欲望支持着他，他不愿意向疾病低头。他坚持不坐轮椅，自己慢慢地走出来。他在我这里4天，是我们父女在一起的最后日子。他当时已经不能表达复杂的意思了，只能说些短句子，可是思维仍然十分清楚、敏捷。他喜欢打弹子，我便带他去社区活动室的弹子房看看。有一个老人正在打弹子，打得好时，爸爸眼神流露出赞许，眼光和以前一样有神。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么一双活泼而有生机的眼睛在一个月后竟然永远闭上了。他在我这里对我的最后嘱咐是要我和妹妹互相关心、照顾。他说：“爸爸妈妈总是要死的。”我当时一听便不禁潸然泪下。

他在温哥华时，我开车带他游览观看温哥华的市容。他十分欢喜这个北美城市的美丽、干净和宁静。我总说以后等他好些再接他来，此愿是再也不能实现了。他离开机场时的哀伤、留恋的眼神，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眼圈红红的。我多么后悔没有留他多住几天，好多看他几眼啊！

2010年，为了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我写过一首诗：

练字亦练人，眉批透亲情。
临帖需创新，下笔才有神。
人生多跌宕，坚韧方能行。
理解何需言，点拨入儿心。
言传并身教，著书也育人。
时光不虚度，潇洒对人生。
廿年弹指间，父女情长存。

一转眼，爸爸走了24年了，但他驰骋一生的文坛，他的读者，朋友们都仍然在怀念他，他的小说《红日》仍在流行，电影《红日》的插曲人们百唱不厌。人总是要死的，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能带着丰硕的成果，这么多的友谊和怀念而去，那就再没有什么可抱憾的了。

爸爸已经走了，可是，我还总在心里和爸爸谈心，倾诉自己的高兴和烦恼，就好像当年一样，我愿意想他仍然和我在一起，他也确实和我在一起，我永远怀念他。

爸爸为我铺就了音乐的道路

□尹 松

爸爸逝去20年了，我常常凝视着这张摄影家朱延龄拍摄的照片：爸爸手捧着书在卧室的窗前，坐在他最喜爱的那张藤椅上微笑地看着我，阳光暖暖地从侧面照射进来，我的心中也是暖暖的。爸爸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既是强大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也是这么充斥着满满的柔软的爱的。

记得我们姐妹深夜畅谈时候，爸爸会兴致勃勃地来参加，天南海北什么都谈，谈国家大事，谈个人的工作、生活上的烦恼，也谈电影、小说。我们每一个子女至今怀念那些充满家庭情趣的深夜——我们围坐在一起，有讲不完的话，夜深了，冲上一杯咖啡，或吃块冰淇淋。爸爸喜欢这样与儿女们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代沟，谈得很投机、畅快。我们姐弟无论碰到什么困惑和困难，总是向爸爸求助，而爸爸总是那么的愿意在各方面给我们帮助。

我参加工作后，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屡遭坎坷。我先是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来又到了哈尔滨。每年回家探亲，家里人到火车站接送简直就是场战斗，大家都带许多行李，要抢列车上的行李架放行李。有一次把妹妹模模都挤落到站台下面去了。爸爸几乎每次都参加这样的“战斗”，那时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一次为了搬一袋我带回来的黄豆，他一脚踩在车站搬运行李的行李车上，一脚踩在火车车厢上，不知何故火车突然开动了，他差一点就摔下来。每当我离开上海回建设兵团，火车开动后，我望着渐渐远去的爸爸的身影，心里总是激动不已，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曾为此给爸爸写过一封长信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他的回信只是淡淡的、不以为然的。1990年，我在深圳分到了房子后，赶紧添置了一些家具，想让爸爸来后能享受一下，可是他却没能赶上。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揪心地难过：您给了我一辈子，而我能够给您的却太少太少。

24年前的3月18日，我从深圳赶到上海，从机场直接到华东医院。爸爸当时还能够坐在一个藤椅上，看到我时他上下打量我，他喜欢看我穿漂亮的衣服，那是表示欣赏我的服装，我当时穿着海蓝色的呢子大衣，下面是红格子呢裙，我故意逗他说：“怎么样，漂亮吧！”他笑着点点头，说，“漂亮”，那时他还能够重复别人的话，自己主动说话已有困难。但没想到致命的脑瘤已压迫了他的语言神经，使他无法说话，而正在迅速增大的瘤子，最后终于压迫到他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呼吸神经。

4月10日，爸爸临终时我在他的身边，他两眼盯着我，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可又说不出来，我知道他是要关照我们姐弟今后要互相帮助，前几日他总是困难地说“团结，团结”，而他是遗憾再也帮不了我们了。我一再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互相帮助，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好的”。我紧紧握着他那软软的暖暖的手，心里仍然拼命地盼望着想，我们几个孩子都在拉着你，你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爸爸还是离去了，我们依赖的大树还是倒了。20多年过去了，我却觉得爸爸还是活在我心里，他总是微笑地慈爱地看着我，一如既往地鼓励着我。

20多年来，爸爸对子女的鼓励推动着我们不断进取。我从当年的钢琴助教，成长为一名钢琴国家一级演奏员，开过多次独奏音乐会，重奏音乐会，双钢琴音乐会，与国内外指挥合作演奏过多首钢琴协奏曲，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而且在钢琴教学领域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在深圳开办了萧邦钢琴艺术中心，我的学生获得了国内外多项钢琴比赛的大奖，许多学生走上了从事音乐专业的道路。今天，回想起我几十年的音乐之路和成长之路，是爸爸一直陪伴我走过来的。

我从小和姐姐一起学钢琴，一开始家里并没有钢琴，我们俩要到常熟路口的老师家里去学琴和练琴，每天只能练习45分钟，后来有一天家里买了一台钢琴，是进口的立式琴，我们可以在家里尽情地练琴了，而爸爸也为我们重新找了一位更好的老师来家里教我们。直到我已过而立之年，在南京艺术学院担任钢琴专业的助教工作时，才在南京军区的朋友那里得知了我们家钢琴的来历。在解放初期，爸爸曾经担任过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前身）的文化部副部长，在那期间，爱才的爸爸将部队文工团的许多有才能的军人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他们当中有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曲家陈钢。一位后来知名的音乐家来看望爸爸，谈到学习作曲没有钢琴的苦恼，此时爸爸已转业到了上海，并出版了一些作品有些稿费。爱才的爸爸立刻豪爽地买了一架钢琴送给他。过了一段时间，音乐家又提到那台琴不太好。爸爸又再买了一台钢琴给他，说，那一台就拉到我家里来吧，我的两个女儿正在学钢琴。我就是这样和姐姐一起有了钢琴，那年我7岁。

爸爸出生在苏北的一个小镇，又经过了多年的戎马生涯，在50年代能够有让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这样的见识真是难能可贵。而他仗义疏财，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我亲眼见的，听说的，他生前身后有太多人提及了，但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放在嘴边。

爸爸特别高兴我和姐姐会弹钢琴，特别是我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专业学习钢琴后，他总喜欢带我到各种场合，总喜欢说“我这个女儿会弹钢琴”。记得刚进附小，一次考试成绩不错，老师鼓励我让我参加学校的演出，其中有一首曲子叫“小丑”，我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他在旁边做出各种滑稽的表情跳舞来启发我，至今还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见人要有礼貌，要叫叔叔阿姨，可是爸爸给了我一个特权，那就是只要我在弹琴的时候，家里来任何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专心弹琴。我想，我弹琴一直有很好的完整性，与此是有一定关系的。

1988年，当时我已经从钢琴专业研究生毕业，拿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学位，刚调到深圳交响乐团工作不到1年，事业上还没有完全打开局面，平时还要去酒店宾馆之类的地方去“捞外快”。那期间他两次到深圳，在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写东西，有时还会晚上跑到我找外快弹琴的酒店来听我弹琴，甚至还有一次把花城杂志的总编李士非先生也拉来听“我女儿弹琴”。爸爸一直是这样用欣赏的方式，鼓励我，使我在艰难的曲折的学琴道路上走了过来。可惜他没有听过我的正式的演出。他为我写的书法：“松儿座右——艺海无涯”成为我终生的座右铭。

自从我进了上音附小专业学习钢琴后，爸爸认为我应该接触各类艺术形式，特别是表演艺术，来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他赞同和鼓励我去观看各类艺术表演，他特许我在他不在上海的时候，直接打电话到作家协会，让郭信和阿姨帮忙买票给我，任何演出票都可以，无论多贵都可以，票钱直接从工资里扣。拿了票，我就兴致勃勃地自己去看，可能的话他也陪我去看过。我那时候把能够看的名家的演出几乎都看了，戏曲有京剧、昆剧（京昆、苏昆）、越剧、沪剧、扬剧、汉剧、吕剧、黄梅戏、京韵大鼓、河南坠子、评弹、说书、歌剧、舞剧、话剧等等，大艺术表演家周信芳、荀慧生、李玉茹、俞振飞、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蒋月泉、徐丽仙、刘韵若、余红仙、任桂珍、施鸿鄂、舒巧等等的表演我都看了，而且都不止一次地观看，还有许多艺术家现在已经数不出来了。从附小到附中一直是这样尽情地看各种表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停止了。多年下来，受着中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那些点滴的精华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积累，使我对艺术的理解，对我的艺术生涯有多么重要！

我从事钢琴专业的工作至今已有近40年的时间了，演奏和教学常常交织在一起。前15年是在学校教钢琴，以教学为主演出为辅。自1988年到深圳交响乐团工作，做了专职钢琴演奏家，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过钢琴教学工作，还开办了自己的业余钢琴艺术中心，从事业余钢琴教育。可以说我一直从事教育，而在如何对待教育的问题上，却是爸爸教育了我。我深深受到爸爸的影响，最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自己。

我曾经对学生、对儿子都不够耐心，常常大发雷霆。爸爸是看到过我给学生上课，如何教学生的，他不能容忍我对学生发脾气。课后他十分严肃地批评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学生！老师就是这么当的吗！对我对儿子的粗暴更是不能容忍，他经常在信中说到此事，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对4岁不到的娃娃，不能用大人的标准衡量，即使对青年、成人，也要允许犯错误，也要允许犯了又改，改了又犯，犯了再改。这个，每人想想自己，对照一下就行了。要求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循规蹈矩，五讲四美，天天向他进行说理教育，一见到他有无理无礼之处，就大发雷霆，甚至打骂相加，只能给他效法，今后对人又打又骂。我一见到对孩子凶狠打骂，不但心痛，而且非常仇恨，我以为那是‘不仁’，是残酷，是违反童心人性的粗暴之举。”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觉得他是祖孙隔代亲，有溺爱之嫌，而学生家长都认可我的严格的嘛。可是时间长了，我对照父亲对我的教育，认识到打骂发火并不意味着严格。爸爸从来没有打骂我们但并不是没有要求啊。渐渐地我也学会了不再粗暴，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慢慢地引导。学会了从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

爸爸对家庭对子女倾注的是温情、是爱抚。他从不使用暴力，从小到大，他几乎没有打过我一个巴掌。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要么是在书房写作，因为大量抽烟，房间里烟雾弥漫。他规定了，只要他在写作时是不许我们去打扰的，除了吃饭时间。要么就是带我们子女上文化俱乐部，那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有电影看，还有冰淇淋吃。爸爸常爱带我出去玩，上朋友家，也许因为四姐弟中，我的年龄适中，再则也可能我有一点音乐天赋，钢琴弹得不错，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就读。可有时候我不识时务地硬缠着要跟他出去，跟到家门口，他无法摆脱，于是就把我推到房间里，可我人小灵活，又坚定地跟到门口，他虽然心急如焚，可仍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将我推回到房间里，从不粗暴，直到我泄气为止。

在我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初二的学期末，音乐界刮起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三化”之风，现在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爸爸和我的学钢琴的同学邓小妮的爸爸邓旭初（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听说了中央的精神要大量地砍掉钢琴专业，除了少数尖子外，钢琴专业的学生都要改学民乐，而我和邓小妮的条件只能改学二胡，眼看培养我们成钢琴家的愿望将由于政治风云变换而破灭，两位爸爸这时候想让我们转学改学文化课。虽然现在看来他们轻视民乐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我只是想说，爸爸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使我至今仍十分佩服。

爸爸知道当时的我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音乐，不会轻易同意转学，因为他跟我谈过，我根本就不同意。有一天他忽然问我：“你最崇拜的作家是谁？”那时，爸爸的小说《红日》已红遍了全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我却没有看过，理由是“不喜欢看打仗的书”，我看《红日》是在“文革”中造反派来抄家，抄走了所有的小说，我们几个孩子趁他们不注意藏起了一本《红日》，这时才认真地看了，此是后话。当时我正迷上了闻捷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于是我说 “是闻捷”。没想到过了几天，闻捷竟然到我家来了，原来爸爸认为自己说服不了我，于是让我崇拜的闻捷来劝我改行转学的。总之最后我还是被说服放弃了学音乐，转学到了普通重点中学——上海市二女中读初三。当然谁也没有料到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邓小妮的命运经历了很大的波折，庆幸的是最终我们又都回到了钢琴身边。但当时爸爸为了说服我所花的心思却使我钦佩不已——他是用智慧来进行教育的。

后来爸爸在病中已经不能言语，也无法书写，但我可以从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中猜到他的意思，他常常紧紧握住我的手，也这样紧紧握住弟弟的手，抖动着，我能明白这“紧握”中的千言万语，但我却不忍去想，那一定是说他不能再为我们做事了，他感谢我们对他的照顾，希望我们好好地生活工作。他就是这样总是在为我们做事，可对我们为他做的事总要说声谢谢。别人都感到奇怪，可他却说：子女不是父母的奴隶嘛，平等的嘛，孩子为我做事当然要谢谢。爸爸，可您殊不知我今天为无法报答您而终生抱憾！虽然那病中的20多天给了我最后的机会，可这机会来得太不近人情。

爸爸虽然故世20年了，但我觉得他始终和我在一起。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爸爸既是强大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是宽容温和的，充满慈爱。他始终是我的榜样，始终在激励我。我时时感受到父爱是如此的深厚，源远流长，父亲的恩情是如此博大得无法言谢。爸爸帮助我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又鼓励我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追求，成为了一个钢琴家，和一个懂得用智慧的钢琴教师。我在这条艰辛的音乐道路上享受到了无尽的快乐。我想，这也一定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吧。